

后 TPP 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陈淑梅 高敬云

【摘要】21世纪以来,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竞相施加系统性和全球性影响:通过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深化其区域一体化程度,在解构现有价值链的同时,正在试图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分析后 TPP 时代区域一体化特征的基础上,从 TPP 边境后新规则视角,探究不断深化的区域一体化正在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通过分析得出,借助整合和创新区域价值链上各经济体的经贸规则,不断深化的区域一体化在促进区域内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便利化、标准化和协调化的同时,正逐渐割裂即有价值链分工格局,进而可能彻底破坏现有价值链,从而达到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目的。不管未来 TPP 的命运如何,西方发达经济体以 TPP 规则力图重新改写全球经贸规则的事实无法改变。中国要从世界制造中心发展为世界创造中心,必须彻底摆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的困境。因此,从如何深化区域一体化提出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TPP; TTIP 与 RCEP; 全球价值链; 深度一体化; 规则创新

【作者简介】陈淑梅,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mail: csm@seu.edu.cn; 高敬云,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2017.4.124~144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TPP 制约下江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15ZD00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应对 TPP、TTIP 与 RCEP 的策略研究”(16AJL010)的阶段性成果,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242017S100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显著特征,逐渐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成为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亦提出了全新要求;而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停滞不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的剧增,进而反过来加快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截至2016年底,通报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高达635个,其中423个仍然有效。2017年1月23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旋即签署了

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 TPP,原先包含12个成员的 TPP 变更为“TPP-11”,标志着后 TPP 时代的到来。不管未来 TPP 的命运如何,无法改变的现实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固化状态已经被打破,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性转移和攀升成为常态。^①以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正试图通过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深化区域一体化,竞相角逐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已较为明显。^②

一、文献回顾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区域主义开始了新一轮浪潮,“深度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焦点。深度一体化最早由哈佛大学罗伯特·劳伦斯教授作为与“浅度一体化”相对应的概念而提出。他认为,迫于全球化压力而产生的深度一体化还包括消除那些制约跨境贸易和服务转移的法律和规制政策的行动,^③以此强调边境后一体化。深度一体化作为一种明示的政府行为,旨在通过协调与合作来降低国内规制政策所导致的市场分割效应^④,尽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深度一体化也不一定优于浅度一体化^⑤。国家间经贸政策的协调可以保障生产得以跨境顺利进行,从而便于不同国家间的商务活动,因而催生了对深层次一体化的需求。随着国际贸易逐渐由最终品贸易转向中间品贸易,对能够解决跨境问题的深度贸易协定有了进一步的需求。事实上,签订深度贸易协定的国家间的贸易量远远高于签订浅度协定的成员间的贸易量:区域贸易协定中每增加一个条款,平均将增加2个百分点的零部件的贸易;^⑥深度贸易协定平均提高其成员间生产网络贸易达近35个百分点。^⑦毋庸置疑,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将影响未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其理论根源于波特(Porter)和寇伽特(Kogut)的价值链理论^⑧分析,经过格里芬(Gereffi)的全球商品链理论^⑨等逐步演化而来。学者们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驱动力、创新、测度以及影响与对策,并聚焦于企业和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及贸易利得等层面。^⑩关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虽然涉及制造业升级路径、区域合作方式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探讨^⑪,但是整体而言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深度一体化的投资效应、自贸区战略以及发展模式等进行了深入探究,^⑫但将区域一体化深化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相结合的研究在国内外仍鲜见。尽管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间的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渐明朗^⑬,但是政策讨论中仍未特别关注^⑭。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发展中经济体力量的整体崛起,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美欧侧

重推动深度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其作为贸易规则制定的新平台,争抢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先机。^⑮2016年10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TPP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TPP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和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布局,自TPP首轮谈判开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研究的侧重点伴随TPP发展进程变化而变化,且贯穿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中。具体而言,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谈判动因^⑯、内容与特征^⑰、谈判进展与发展前景^⑱以及基于宏观经济、具体产业、条款和比较视角下的影响与对策^⑲研究,但是有关TPP规则所反映的深度一体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本文从规则创新视角,借鉴20世纪典型区域贸易协定与区域价值链的建构经验,探究后TPP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区域一体化深化之间的关系,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深化区域一体化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国际经济影响力建言献策。

二、后TPP时代区域一体化的特征分析

21世纪以来,随着亚洲区域主义的迅猛扩散,亚洲范围内深度交织的生产网络已经逐渐将美国边缘化。^⑳随着美国正式宣布退出TPP,日本正试图接替美国,努力推动TPP的生效,通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来打破并重构亚太价值链。3月14日美国候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表示,将与日本等TPP参加国推进双边谈判,“力争达成超越TPP的协议”^㉑。与此同时,美国并未放弃与EU的TTIP谈判,试图通过跨大西洋市场和规制的整合,提升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地位。随着TPP的停摆,研究人员认为,应加快RCEP谈判进程,并希望RCEP下一阶段谈判能借鉴或涵盖TPP一些长处^㉒,致力于区域经济合作、规则水平提升、区内协定整合,努力构建高质量、综合性和地缘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维护亚太价值链的发展。因此,研究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必须先分析以TPP、TTIP和RCEP(以下简称三大巨型FTA)为代表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特征。

(一)巨型化

巨型区域贸易协定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例如,1993年成立的EU和1994年成立的NAFTA,以及

21世纪问世的TPP、TTIP和RCEP。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共同特点是其影响的系统性和全球性^②；换言之，它们足够大、足够广，以致它们对贸易规则和贸易流动的影响远远超越其实施区域。彼得·德雷珀等以三大标准界定了巨型化，即协定谈判成员包含三个及以上的经济体，成员贸易总额达到或超过世界贸易总量的25%，谈判议题超过当前WTO协议的范围。^③不同于当初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的发起国仅为六个西欧国家，NAFTA成员国仅为三个北美国家，等待成员国相关机构批准的TPP，以及正在进行谈判的TTIP和RCEP，所涉及的经济体数量及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巨型化的特征。具体而言，三大巨型FTA均由10个以上的经济体组成，囊括的经济体贸易总额均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4及以上，涉及的谈判议题更多强调边境后规则，体现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要求。

(二)开拓性

后TPP时代区域一体化的开拓性主要体现在议题的广度和深度两个不同维度。就广度而言，三大巨型FTA均增加了诸多与边境后规则相关的远远超过当前WTO协议所含范围的新议题，拓宽了国内规则，以促进区内市场整合，体现了国际经贸活动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更高要求。相对于美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TPP中有五分之一的议题为新增议题。^④TTIP除了开放双方在其他贸易协定已开放的贸易领域，还将开放诸如交通等一些新领域^⑤，增强市场准入程度。RCEP则通过渐进式方式推动谈判议题的深入，更加注重服务业开放议题的谈判。就深度而言：一方面，议题侧重国内政策改革，更多强调边境后规则，而且远远领先于WTO的规则水平，^⑥例如，TPP严

苛的劳工和环境条款^⑦；另一方面，议题反映了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要求，以利于深化区域一体化纵向发展，例如，TPP成员更加重视关于全球价值链和新型生产网络的议题^⑧，TTIP谈判方注重管制协调和标准统一问题的谈判，RCEP更加注重成员国协调发展。

(三)交叉性

21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在拓展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三大巨型FTA在成员扩大方面均更具开放性，导致协定成员呈现高度重叠性，使得同一成员国面临错综复杂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因而，区域一体化这种交叉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投资效率，增加了多重治理的成本，^⑨加剧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比如，同时参与TPP和RCEP谈判的国家有7个(见附图)，由于这两大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在某些条款和规则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这七个国家可能会面临国际经贸规则差异性的困扰，增加经贸经营成本，降低从贸易协定中所获得的收益。

(四)独特性

后TPP时代的区域贸易协定间虽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但彼此相对独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贸易协定实现一体化目的和途径有所不同。例如，TPP重点在于建立贸易规则和秩序，而RCEP建立后3-5年的首要任务是促进零关税和推动地区内的投资贸易增长。^⑩被称为“经济北约”的TTIP目的是通过美欧合作，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平台，以维持发达国家集团对未来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⑪具体而言，TPP是当初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平衡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在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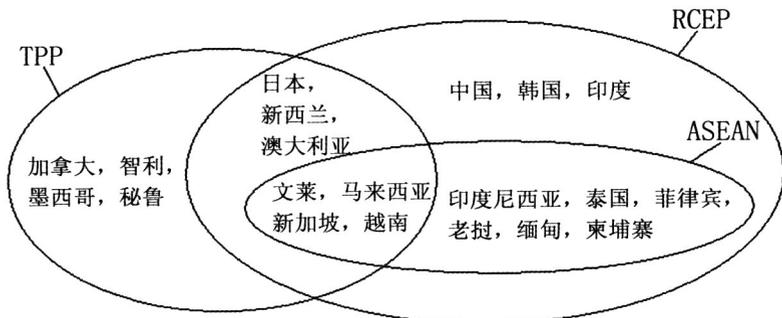


图 TPP与RCEP成员交叉情况

地区的领导地位。因而,TPP重在强化规则的一致性和约束力,其具体条款超出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带有美国经贸理念和商业价值观的烙印。RCEP更加强调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对成员国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加强成员国间经贸活动的互补性,通过渐进式发展道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而且,作为“10+X”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构想的继续,RCEP将会是一个部分范围的超WTO协议,侧重货物贸易、一些服务贸易和投资贸易。^③尽管美国已正式退出TPP,并宣布可能重谈NAFTA,但是美国亦已声明将与相关贸易伙伴一一展开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继续影响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维护其在全球经贸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五)排他性

21世纪的区域一体化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对非成员国利益的潜在损害和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第一,非成员国利益之损。例如,TPP能增加大多数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效益,但通常会损害非成员国的相关利益。^④同样,TTIP通过市场和规制整合将使美国和EU从中获益^⑤,促进美欧经济复苏^⑥,但通常会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⑦。RCEP能有效整合亚太区域合作机制^⑧,驱动成员国经济增长,但对非成员国将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⑨。第二,国际经贸规则之争。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导致各国或地区通过贸易协定竞相角逐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话语权。例如,EU从2006年开始,转向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3年启动与美国的TTIP谈判,反映了利益追逐下的规则之争。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和推动的TPP,既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布局,又是美国寻求新竞争优势和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为应对TPP的挑战,ASEAN主导和推动RCEP谈判,在注重规则和合作协调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

三、TPP开启的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的再构建

理论上而言,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可以两种不同方式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其一,成员国通过签订的深度贸易协定中的边境后规则便利成员国间贸易,进而逐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其二,原先已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愿意通过签订深度贸易协定

以保障其向其贸易伙伴提供中间品和相关服务。因此,已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经济体与其他成员商签深度贸易协定是为了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地位,并伺机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未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已经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经济体与其他贸易伙伴商谈深度贸易协定则是期待通过协定制定国际规经贸新规则,改变原先成员国间贸易格局,达到重新构建区域、甚至全球价值链的目的。以TPP、TTIP和RCEP为代表的巨型贸易协定在彰显与20世纪的EU和NAFTA不同特征的同时,正在试图以规则创新重构全球价值链。截至目前,TTIP和RCEP仍在商谈之中,尚未达成协议。TPP已签,文本已问世,虽然TPP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相比TTIP和RCEP而言,TPP水平更高,通过制定意在引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新议题,将边境规则拓展至边境后规则,深化区域一体化的同时,则会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已经正式宣布退出TPP的美国仍期待与其他TPP成员国“力争达成超越TPP的协议”^⑩,而TPP-11的成员仍在努力促成TPP生效;与此同时亚太区域研究专家则希望“RCEP下一阶段谈判能借鉴或涵盖TPP一些长处”^⑪。这些均从不同角度表明TPP规则的高标准。因此,本文以TPP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国有企业条款、劳工条款和环境条款等典型边境后新规则为例,探究TPP开启的新规则将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理论依据。

(一)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将首先破坏亚太地区即有价值链。原产地规则是TPP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也是区域一体化深化的典型代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价值链链条跨国分布不断明显,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深化,特别是亚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然而,由于受金融危机和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等的影响,美国一直未能在亚太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而,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借助TPP建立一套系统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改变亚太地区原有价值链分工格局,弱化亚太价值链原有参与国的竞争力,导致亚太地区原有贸易、投资和市场重新调整、甚至消失,从而打破原有

亚太价值链。美国宣布退出 TPP 之后,这也正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签约国继续积极推进 TPP 生效的重要原因之一。TPP 最新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一章^②明确提出,其制订的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以纺织业为例,TPP 规定成员国实行从纺纱开始的原产地规则,否则无法享受相应的免税政策。TPP “纺织和服装”一章^③中提出的“从纱线开始”的要求,明确提出缔约方以区域内的纱线和纤维织物作为原材料,以促进区域内的供应和投资组合,仅对“短缺清单”中的产品允许使用非缔约方供应的特定纱线和纤维织物为原料。中国是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包括纱线面料、服装等。“从纱线开始”的严苛原产地规则将使我国在内的非缔约方无法继续维持在原有价值链上的位置,人为割裂分工格局,^④变相提高贸易投资壁垒,造成一定的资源配置扭曲,增加非成员国经贸活动成本,弱化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力,导致非成员国产业重新调整和布局,从而打破原有价值链。

原产地规则将再构新的区域价值链。TPP 原产地规则在破坏亚太地区原有价值链后,将试图以其严格约束力消除重叠性贸易协定所产生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强化成员国之间经贸活动的规范性,规范成员国内部产业链的整合,促进成员国区域价值链的形成,提升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达到重构亚太价值链的目的。具体而言,在 TPP 成员国内部,“从纺纱开始”等原产地规则的实施加强了其内部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保护,带动了其内部相关产业的发展,规范了其内部经贸活动,促进了其区内价值链的整合,确保了其关税优惠利益的获得,提升了其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此外,TPP 还规定了区域累积原则,^⑤旨在促进成员间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保护成员国的利益,提高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总之,TPP 原产地规则以其严格约束性深化了区域一体化程度,意图改变亚太地区原有价值链分工格局,削弱亚太价值链原有链条国的贸易和产业竞争力,割裂 TPP 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

系,进而破坏亚太地区原有价值链。在此基础上,借助 TPP 原产地规则,通过加强原本从属于不同子网络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联,^⑥力争消除“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生成新的价值链,重构亚太地区生产网络。换言之,TPP 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通过整合和规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活动,推动成员国经贸活动便利化,促进成员国区域价值链形成,维护成员国整体利益,提升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达到重构亚太地区原有价值链的目的。

(二) 国有企业条款

国有企业条款首先将迫使 TPP 非成员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为打破原有价值链创造机缘。国家比较优势、企业竞争能力和市场运行机制在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PP 新增国有企业条款^⑦作为横向新议题之一,将经贸活动与国内政策挂钩,针对国有企业制定了明确的国际规则,强调企业的商业基础和透明度。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如果要维护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强化国有企业的竞争性或商业化,而这将为 TPP 借国有企业条款打破原有价值链提供契机。

国有企业条款通过深化其内部一体化提高成员国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能力。TPP 国有企业条款在打破原有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基础上,以其边境内规则和强制约束力,规范成员国政府和企业行为,维护私有企业公平竞争机会,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为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创造有利的平竞争机制。由于 TPP 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国有企业条款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利,因而 TPP 根据不同国家特点,规定了相应的豁免权和例外条款,^⑧以促进该条款的实施,从而提升成员国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竞争力,进而达到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目的。

总之,TPP 国有企业条款通过规定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和透明度原则,强化国内政策改革和边境内规则约束力,保证政府行为的中立性,以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而削弱 TPP

非成员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拓展TPP成员国自身企业的国际市场规模,从而打破原价值链分工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规范成员国政府和企业行为,维护私营企业利益,避免因国有企业违反所谓公平竞争原则导致贸易和竞争环境的扭曲,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促进成员国区域价值链的形成,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强调企业公平竞争机制的重要性,提升成员国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优势,从而达到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目的。

(三)劳工条款

劳工条款将经由成本、劳工条件和需求等影响非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通过亚太地区外来劳工的顺畅流动、劳工问题的复杂化、出口加工区的负面效应放大、企业社会责任的透明化等途径最终影响中国等非TPP成员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即有位势。TPP通过规定严格的劳工条款,将经贸活动与之挂钩,以提升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非成员国生产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影响其贸易和投资活动,破坏其原价值链。非成员国为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出口竞争优势,则必须通过国内法律和制度改革对出口加工区原有劳工标准进行升级,向TPP劳工条款靠拢。

劳工条款对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国实行的不同要求使得其成员可以灵活地适应规则,逐步融入符合其条件的价值链位置。对TPP成员国而言,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劳工条款,通过保护劳工权益和提高法制水平,努力创造公平的劳工环境,促成成员国高层次区域价值链,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就劳工条款的强制性而言,TPP要求成员国除在法律和实践中贯彻国际劳工组织所有核心劳工权利外,还应加强出口加工区的劳工保护,抑制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进口、实施强制争端解决机制。

总之,TPP严格的劳工条款,对TPP非成员国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一定的便捷性,即通过提高劳工标准较为宽松的非成员国生产成本,降低其产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其贸易和投资活动及布局。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者,因而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面临新一轮经贸区位选择,一定程度上割断TPP非成员国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从而打破原价值链分

工格局。而TPP对成员国规定的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劳工条款,将经贸活动与之相挂钩,力图提升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水平,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成员国劳工标准和劳动执法水平,从而在成员国内部营造公平竞争的劳工环境,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形成高层次区域内的价值链,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四)环境条款

环境条款主要通过将边境规则扩展至边境内规则,深化区内一体化程度,进而提高非成员国的环境成本,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通常反映政府所采取的如何平衡国际贸易增长和资源保护需求的决定。^④同样,TPP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条款,强化规则的约束力,深化已有区域一体化程度,带动经贸活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试图破坏并重构全球价值链。

总之,基于条款广度和深度的考虑,相对于NAFTA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TPP环境标准有了实质性提高。这些提高增强了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力,深化了区域一体化程度,加强了经贸活动和环境保护的联系。但是,对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TPP非成员国而言,TPP环境标准将环境要素反映在生产成本中,实质上变相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削弱了其产品国际竞争力,阻碍了其经贸合作与发展,打破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原有分工格局。而严格的环境标准与国内相关政策制度相挂钩,强调环境问责机制,规范了成员国政府经贸行为,提升了处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成员国关于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共识,推动成员国区域价值链的形成,进而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综上,一国要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提升其中的地位,就必须超越传统的贸易政策。^⑤TPP正是超越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政策,通过制定高标准的边境后新规则,如单一的原产地规则、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严格的劳工标准和统一的环境标准等,一方面深化了区域一体化程度,使成员间生产共享活动不易被打断或受限因而更具保障;另一方面试图打破原价值链分工格局,从而破坏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对原有区域价值链的重新布局,是各国或地区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区域一体化在打破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和提高区域价值链上各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拓展贸易协定深度,促进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便利化、标准化和协调化,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要求,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

解析 TPP 的谈判过程,解读 TPP 的最终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奥巴马政府当初力主 TPP 的动机之一是继以 NAFTA 构建以美国为轴心的北美价值链之后,期待 TPP 生效后重构亚太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可以继续主导世界经济。此外,TPP 基于全球价值链而推出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不仅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而且可能通过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给就业等带来影响,从而给我国社会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制约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可能迫使我国改变原先的努力方向。

四、结论与启示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流向,全球贸易竞争也正在演变为以价值链竞争为基础的“规则之争”。后 TPP 时代,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而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提出了挑战,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EU、NAFTA 和 AFTA,以 TPP、TTIP 和 RCEP 为代表的 21 世纪巨型区域贸易协定,试图通过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竞相角逐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话语权。本文分析了后 TPP 时代区域一体化的特征,并从 TPP 规则创新视角,探究了不断深化的区域一体化正在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通过分析得出,区域一体化的深化正在破坏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重构。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别以 EU 和 NAFTA 构建了以自身为链主的欧洲区域价值链和北美区域价值链。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切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和出口,迅速在基础设施、市场空间和规模制造能力等方面建立“在位优势”,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代工服务平台。随着发达经济体制

制造业的回流,我国可能逐步失去原本的价值链地位,让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难以为继,需要及时研究是否可以签订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维护现有全球价值链地位,甚至主导重建全球价值链。后 TPP 时代,在从世界制造中心跨越到世界创造中心的进程中,随着作为构建全球价值链主体的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逐渐累积具有整合和升级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但是,遭遇发达国家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阻碍以及自身经济转型与传统优势逐渐减弱的挑战,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的双层竞争。^⑤陷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困境,将使得中国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赢得主动,并不断向高端攀升将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平衡 TPP 开启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带来的负向影响,就可以使我国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关键的时期,按照全球价值链的走势来指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中国每个地区、每个企业所遵循的策略。要利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机会使我国经济结构积极调整,必须采取更开放的政策、营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出台更合理的税收政策。因而,打破 TPP 开启的新规则制约需要国家相关顶层政策设计。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试图从如何深化区域一体化提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启示。

第一,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更好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在解构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区域价值链上的经贸规则,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促进市场和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对原有价值链进行重新布局。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保护主义则为破坏主义。因而,要想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打破保护主义,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以充分释放规则红利。由本文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的解链与重构需要区域一体化以规则创新作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

国家通过国内政策自主权的妥协被动接受高标准规则,以获取区域价值链利益,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在权衡高标准规则和国内政策自主权的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新态势,参与规则创新,进而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以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

第三,加快实施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强化区域自由贸易体制建设。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15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但是,相比美国和EU等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参与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仍偏低。中国在提升已有自由贸易协定水平和深化国内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应该加速正在谈判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进程,兼顾周边与远邻的关系,整合贸易—投资—服务—揽子协议,体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要求,完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体制建设,提升深度一体化程度,促进全球价值链融入。

第四,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以构建我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一直是被动地融入跨国公司打造的全球价值链,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中国在亚太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⑤。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指导下,与“一带一路”其他经济体的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探讨在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为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对接全球价值链找准点位,提供中国方案,逐步扶持我国重点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链主,沿“一带一路”主动构建自身的区域价值链,是抵御TPP等新型贸易协定给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挑战的重要应对思路。

总之,我国应该以“一带一路”为依托,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保障,结合供给侧改革,注重沿线国家区域差异性,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协调发展,促成深度融合的区域一体化,以打破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促进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提高技术、产品等标准衔接,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制定

适宜的区域经贸规则,逐步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包容和协调的以我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提高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全球创新链的构建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捷径。不管未来TPP的命运如何,西方发达经济体以TPP力图重新改写全球经贸规则的事实无法改变。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创新链则是破解TPP开启的高标准规则制约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不二选择;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嵌入价值链拉动相关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融合,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国内经济一体化,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发展新动力的主要源泉。

注释:

①洪银兴:《在价值链竞争中发挥我国新的比较优势》,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27日第5版。

②桑百川:《推动企业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第16版。

③ Robert Z.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p. 7-8.

④ Bernard Hoekman, “Deep Integr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nd Euro-Mediterranean Free Trade”, *Regionalism in Europe: Geometries and Strategies After 2000*, Bonn, November 6-8, 1998: 1.

⑤东艳、冯维江、邱薇:《深度一体化: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系列》,No.09005, V2, 2009年10月15日第11页。

⑥ UNCTAD, “World Trade Report 2011: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 Geneva, 2011, p. 146.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11_e.pdf.

⑦ Gianluca Oreficea and Nadia Rochab,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1-11, July 2011: 1.

⑧ Bruce Kogut,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26, No. 4, 1985, pp. 15-28; Michael E. Porter, *Compet-*

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⑨ 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8, No. 1, 1999, pp. 37-70.

⑩ 参见 Andrea Morrison, Carlo Pietrobelli and Roberta Rabellotti,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to Stud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s*, Vol. 36, No. 1, 2008, pp. 39-58;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 2010, pp. 1017-1027;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 Jin Wei,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9, No. 1, 2012, pp. 178-189; 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第59-68页;孟祺:《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载《财经科学》,2016年第2期,第72-81页;王岚、李宏艳:《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2期,第76-88页;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5期,第38-46页。

⑪ 参见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26-156页;谭人友、葛顺奇、刘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基于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载《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第87-98页。

⑫ 参见东艳:《深度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载《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2期,第397-426页;马学礼:《重塑规则还是整合地缘:亚太经济深度一体化的模式之争》,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54-62页。

⑬ Gianluca Oreficea and Nadia Rochab,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1-11, July 2011: 1.

⑭ 迈克尔·鲁塔著,王宇译:《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改变了什么》,载《金融发展研究》,2015年第2期,第52页。

⑮ 参见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0-

75页;沈铭辉:《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区域还是全球?——美国推动 TPP 的行为逻辑》,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70-94页。

⑯ 参见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0-75页;沈铭辉:《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区域还是全球?——美国推动 TPP 的行为逻辑》,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70-94页。

⑰ 参见 John Ravenh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Multilateralization in Asia", *Studies in Trade & Investment*, 2011, pp. 113-138;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35-59页。

⑱ 参见 Richard Baldwin and Theresa Carpenter, "A 3 Bloc Dance: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ade Giant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 2011, pp. 27-47;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⑲ 参见 Chunding Li, Jing Wang and John Whalley, "Impact of Mega Trade Deals on China: A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Vol. 57, 2016, pp. 13-25; 蔡鹏鸿:《TPP 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第41-45页;陆圣:《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潜在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载《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33页。

⑳ 林桂军、邓世专:《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5卷第3期,第222页。

㉑ 新华社,2017年3月16日, http://www.xinhuaone.com/ckxxDetail.jsp?class_id=63&con_id=863788.

㉒ 印尼—澳大利亚经济管理合作机构(AIPEG)高级顾问萨武奇分析认为,应加快 RCEP 进程且借鉴 TPP 长处,载《雅加达邮报》3月7日,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il/j/201703/20170302529647.shtml>。

㉓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16: Spillovers amid Weak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6, p. 22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 10.1596/978-1-4648-067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⑯陈淑梅:《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定位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⑰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Estimates", PHE Working Paper, 2016, p. 5, p. 17.

⑱陈淑梅:《“一带一路”引领国际自贸区发展之战略思考》,载《国际贸易》,2015年第12期,第51页。

⑲盛斌、果婷:《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15页。

⑳全毅:《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载《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第96页。

㉑刘旭颖:《RCEP谈判加快进程》,载《国际商报》,2016年2月23日第A04版。

㉒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4页。

㉓参见 Chunding Li and John Whalley, "China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Involved", *The World Economy*, Vol. 37, No. 2, 2014, pp. 169-192; Peter A. Petri,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General Information*, Vol. 2, No. 4, 2012, pp. 381-383; 万璐:《美国 TPP 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 GTAP 模拟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4 期,第 59-73 页。

㉔参见 Chunding Li and John Whalley, "China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Involved", *The World Economy*, Vol. 37, No. 2, 2014, pp. 169-192; Peter A. Petri,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General Information*, Vol. 2, No. 4, 2012, pp. 381-383; 万璐:《美国 TPP 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 GTAP 模拟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4 期,第 59-73 页。

㉕Lars Nilsson and Nuno Sousa,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Economic Impact of the TTIP", in Sangeeta Khorana, eds.,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SA: Caught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p. 30. 资料来源: <http://gifta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Khorana-ed.-2015.pdf>.

㉖蔡松锋、张亚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对金砖国家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含全球价值链模块的动态GTAP模型》,载《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第79页。

㉗周茂荣:《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及其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第92页。

㉘郑学党、庄芮:《RCEP的动因、内容、挑战及中国对策》,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33页。

㉙赵亮、陈淑梅:《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基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的比较研究》,载《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92页。

㉚新华社,2017年3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ckxxDetail.jsp?class_id=63&con_id=863788。

㉛印尼-澳大利亚经济管理合作机构(AIPEG)高级顾问萨武奇分析认为,应加快RCEP进程且借鉴TPP长处,载《雅加达邮报》3月7日,资料来源: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j/201703/20170302529647.shtml>。

㉜参见TPP协议文本第3章。USTR, TPP Final Text, Chapter 3. 资料来源: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Chapter-Summary-Rules-of-Origin-and-Origin-Procedures.pdf>,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㉝参见TPP协议文本第4章第4.2条。USTR, TPP Final Text, Chapter 4, Article 4. 2. 资料来源: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Final-Text-Textiles-and-Apparel.pdf>,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㉞金中夏、李良松:《TPP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载《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12期,第8页。

㉟参见TPP协议文本第3章第3.10条。USTR, TPP Final Text, Chapter 3, Article 3. 10. 资料来源: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Final-Text-Rules-of-Origin-and-Origin-Procedures.pdf>,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㊱王岚:《TPP原产地规则对亚太纺织服装贸易格局的影响》,载《财贸经济》,2016年第37卷第8期,第125页。

㊲参见TPP协议文本第17章。USTR, TPP Final Text, Chapter 17. 资料来源: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Final-Text-State-Owned-Enterprises-and-Designated-Monopolies.pdf>,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㊳参见TPP协议文本附录17-E, 17-F。USTR, TPP Final Text, Chapter 17, Annex 17-E, 17-F. 资料来源: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Final-Text-State-Owned-Enterprises-and-Designated-Monopolies.pdf>,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㊴Joshua P. Meltz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

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p. 31.

⑩Dominique Bruh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ep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romoting Trade at the Cost of Domestic Policy Autonom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 p. 2.

⑪孟祺:《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载《财经科学》,2016年第2期,第78页。

⑫许和连、孙天阳:《TPP背景下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8期,第3页。

参考文献:

[1]蔡鹏鸿.TPP横向议题与下一代贸易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7):41-45.

[2]陈淑梅.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定位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3]陈淑梅.“一带一路”引领国际自贸区发展之战略思考[J].国际贸易,2015(12):48-51.

[4]陈雯.试析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东盟区内贸易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2(12):40-46.

[5]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J].国际经济评论,2014(1):45-64.

[6]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2):81-97.

[7]洪银兴.在价值链竞争中发挥我国新的比较优势[N].人民日报,2016-3-27(5).

[8]金中夏,李良松.TPP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J].国际金融研究,2014(12):3-14.

[9]李景海,林仲豪.世界政治经济演变、新产业政策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3):105-121.

[10]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12(2):17-27.

[11]刘维林.中国式出口的价值创造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析[J].世界经济,2015(3):3-28.

[12]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13]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J].当代亚太,2014(4):126-156.

[14]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J].当代亚太,2012(1):35-59.

[15]陆圣.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的潜在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J].世界经济研究,2013(11):27-33.

[16]马春光.跨国公司产业价值链转型对我国制造企业的启示[J].管理世界,2004(12):140-141.

[17]孟祺.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J].财经科学,2016(2):72-81.

[18]米歇尔·鲁塔著,王宇译.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改变了什么[J].金融发展研究,2015(2):51-53.

[19]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经济研究,2011(11):21-35.

[20]全毅.全球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J].经济学家,2015(1):94-104.

[21]桑百川.推动企业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N].光明日报,2016-3-24(16).

[22]沈丹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N].人民日报,2016-3-27(5).

[23]沈铭辉.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区域还是全球?——美国推动TPP的行为逻辑[J].当代亚太,2013(6):70-94.

[24]沈铭辉.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与TPP投资条款的比较分析——兼论对中美BIT谈判的借鉴[J].国际经济合作,2014(3):21-25.

[25]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0-75.

[26]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4-9.

[27]盛斌,果婷.亚太区域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0):4-21.

[28]谭人友,葛顺奇,刘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基于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6(5):87-98.

[29]万璐.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拟的分析[J].当代亚太,2011(4):59-73.

[30]王岚,李宏艳.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2):76-88.

[31]吴芳,陆娟.1+1=?一项有关品牌联合效应的探索性研究[J].财贸研究,2009,20(4):121-129.

[32]许和连,孙天阳.TPP背景下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8):3-13.

[33]余南平.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抛弃冷战思维[N].人民日报,2016-5-8(5).

- [34]张辉.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5): 38-46.
- [35]张杰, 陈志远, 刘元春.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 经济研究, 2013(10): 124-137.
- [36]张学良. 国外新区域主义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5, 27(5): 16-20.
- [37]张宇燕. 多角度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 1-1.
- [38]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
- [39]周茂荣.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及其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1): 77-93.
- [40]Andrea Morrison, Carlo Pietrobelli and Roberta Rabellotti.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to Stud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king Papers, 2008, 36(1): 39-58.
- [41]Bruce Kogut.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5, 26(4): 15-28.
- [42]Chunding Li, Jing Wang and John Whalley. Impact of Mega Trade Deals on China: A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7: 13-25.
- [43]David A Gantz. World Trade Law after Doha: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pproaches[J]. Arizona Legal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2-01, 2012.
- [44]Dominique Bruh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ep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romoting Trade at the Cost of Domestic Policy Autonom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 1-41.
- [45]Gary C Hufbauer and Cathleen Cimino-Isaacs. How Will TPP and TTIP Change the WTO System [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5, 18(3): 679-696.
- [46]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37-70.
- [47]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
- [48]Gianluca Oreficea and Nadia Rochab,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1-11, July 2011.
- [49]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2010, 36(9): 1017-1027.
- [50]Joshua P Meltz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1-32.
- [51]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 [52]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Estimates[J]. PIIE Working Paper, 2016: 1-33.
- [53]Peter Draper, Simon Lacey and Yash Ramkolowan.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J]. Environment, 2014, 3(2): 1-53.
- [54]Richard Baldwin and Theresa Carpenter. A 3 Bloc Dance: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ade Giants[J].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11, 55(1): 27-47.
- [55]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1): 178-189.
- [56]Robert Z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